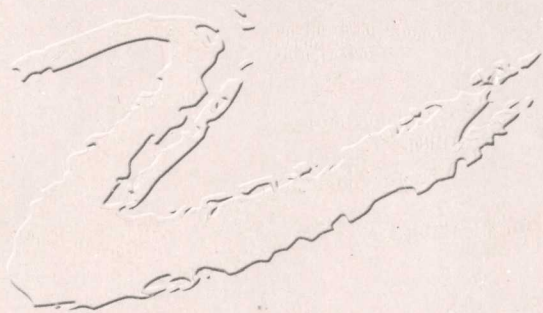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梁启超

LIANG QICHAO

齐春风◎著



大家精要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策划

大家精要

梁启超

齐春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 / 齐春风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 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415-3668-7

I. 梁… II. 齐… III. 梁启超(1873~1929)—传记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1244 号

出 版 人: 李安泰

策 划: 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易 山

整体设计: 向 炜 高 伟

大家精要

DAJIA JINGYAO

梁启超

LIANGQICHAO

齐春风◎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650034—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10 字数: 100 千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5415-3668-7

定价: 16.80 元

目 录

梁启超
LIANG QICHAO

001

第1章 梁启超的生平及其家庭 001

梁启超的早年 001

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003

第2章 维新变法的主倡者 007

初入康门 007

参与维新宣传 009

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 011

第3章 流亡海外的活动 016

与孙中山合作的破裂 016

参与谋划自立军起义 018

成功的报业生涯 020

与革命党人笔战 022

政闻社的成立与解散 028

辛亥革命后的谋划 032

第4章 归国后的活动 038

联袁的实践与失败 038

笔伐袁世凯 047

谋划护国运动 051



002

拥戴段祺瑞	056
参与“五四”	063
游历欧洲大陆	066
溘然长逝	071

第5章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075

“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075
“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	081

第6章 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091

发展农、工、商业的思想	092
改革金融的思想	094
整顿赋税的思想	096
利用外资的思想	098
发行内债的思想	103

第7章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105

第8章 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117

批判旧史学	117
构建新史学	122
史学研究工作	127

第9章 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146

结语	151
----	-----

附

年谱	153
主要著作	155

第 1 章

梁启超的生平及其家庭

梁启超的早年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的一户小康之家。

广东梁氏始祖为宋代的梁绍。梁绍中进士后，到广东为官，遂在广东定居。梁启超的祖父名叫梁维清。他为了跻身于上层社会，努力读书，但只中了一个秀才便止步不前了，官职也是卑微的八品官——教谕。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是梁维清的第三子，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如他的父亲，虽然皓首穷经，竟然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中，最后不得不做了个私塾先生，在家乡教育子弟。梁启超的母亲赵氏，生四子二女，梁启超15岁时，赵氏因难产而死。

在封建时代，幼小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汲汲奔走于功名利禄，况且对于这个长孙，梁维清更抱以很大的期望，希望他金榜高中，光宗耀祖。梁启超从四五岁起，就由祖父等人教读四书五经，背诵一知半解的古人的“嘉言懿行”。

天资聪颖的梁启超的进步是迅速的。刚刚六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八岁开始学习作文，九岁时已经能够写出洋洋洒洒长达千字的八股文。梁启超吟诗作对的本领也显现出来。曾有访客出上句“饮茶龙上水”，他听后不假思索，随即对出“写字狗扒田”，上下句都是新会俗语，可谓浑然天成。还有一次，一位先生吟出一句“东篱客赏陶潜菊”，梁以“南国入思召伯棠”相对，引得满座喝彩。1882年，望子成龙的长辈迫不及待地安排九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去应童子试。船沿西江溯流而上，满船应试的童生有的已四五十岁，年轻的也有十多岁。大家吟诗弄句，卖弄文采，好不热闹。有人提议以正在食用的咸鱼为题作诗，在大家搜肠刮肚地组织词句之际，幼小的梁启超不慌不忙地吟出“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的诗句，顿时语惊四座。从此，梁启超“神童”的美誉传遍县境。

初次应试虽然没有考取，但梁启超初入省垣，也算增长了见识。1884年，11岁的梁启超再赴广州应试，一举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对于梁启超所取得的功名，梁家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梁启超的祖父努力了一辈子所取得的成绩，梁启超小小年纪轻而易举便取得了。到他父亲中衰的功名在梁启超这里又有了恢复的希望，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气势。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到广州参加乡试，一举得中第八名举人。主持乡试的主、副座分别是贵州的李端棻和福建的王仁堪。两位都已看出年少得志的梁启超前途不可限量，都想和梁启超结下秦晋之好：王想让梁启超做他的乘龙快婿，李则想把妹妹李蕙仙的终身托付给梁启超。结果李先开了口。1891年秋，梁启超进京与长自己四岁的李蕙仙结婚。李蕙仙对梁启超助益甚大，原来梁讲一口广东话，对外交流多有不便，在李的悉心教导下，梁的北京官话进步很快。对此，梁启超曾感激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

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1891年11月，19岁的梁启超和23岁的李蕙仙在北京结婚。在北京过了近半年的新婚生活，梁启超于1892年夏携新婚妻子返回广东老家。1893年，女儿思顺出生。戊戌政变后，梁出逃日本，李蕙仙毫无大家闺秀的架子，奉老养小，是十足的贤妻良母，与梁算得上患难夫妻。对李操持家庭的辛劳，梁终生感激不尽。后来梁将她接到日本。1900年她生一子，但不幸于两月后夭折。1901年，生子思成，1908年生女儿思庄。

梁启超的夫妻生活是美满的。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去世，梁启超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祭梁夫人文》。在文中，梁启超概括他们的关系是：“我德有厥，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挟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懊便康；我老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榆君扬。”在这种文体中，虽不免有溢美之词，但他们夫唱妇随的情景也得到了生动的记述。

1900年，梁启超应康有为之邀前往檀香山，在那里他有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艳遇。有一位年方二十的华侨小姐何蕙珍为他做英文翻译，口齿伶俐，落落大方，对他又心仪已久，愿以终身相许。也有朋友劝梁娶一位通晓英文的太太，这样既有了翻译，又能助其大展宏图。面对充满青春活力的姑娘的追求，梁启超心神不宁，进退两难。他前前后后写了24首情诗，记录了他内心的煎熬。他感激何小姐对他的爱恋：“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梁在心灵深处对何小姐是赞叹的：“目如流电口如河，睥睨时流振法螺。不论才华论胆略，须眉队里已无多。”对两人的分别，

梁很怅然：“匆匆羽檄引归船，临别更慳一握缘。今生知否能重见，一抚遗尘一惘然。”但最终，梁还是没能接受何小姐的爱情。对此，他说明了原因：“匈奴未灭敢言家？百里行犹九十赒。怕有旁人说长短，风云气尽爱春华”；“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作后人师。”瞻前顾后，梁启超最终还是结束了这段令他心猿意马的异域情恋。

在难舍难分之际，梁启超有一个惊人之举：他于1900年5月24日给李蕙仙写了一封长信，将他与何小姐的这番奇遇和盘托出。李蕙仙也不是等闲之辈，接信后并未暴跳如雷，反而极为宽容。她写信给梁，说她打算禀告公公，让梁纳何小姐为妾，成全他们的炽热感情。梁父教子颇严，梁启超赶紧写信制止，下决心结束了这段恋情。

不过此后，梁启超还是纳了一位小妾，只是未予公开。这名侧室是由李蕙仙亲自选定的。李以自己体弱，不能为梁家多生子嗣为由，于1903年为梁启超选定王桂荃为妾。王桂荃原名来喜，生于1886年，四川广元人。她出身贫苦，曾四次被人倒卖，饱尝了人世的苦难和辛酸。1894年，李蕙仙回贵州探亲，将来喜收做贴身丫鬟。进梁府后，梁启超为她取名桂荃。王桂荃生有五男两女：1904年生思永，1907年生思忠，1912年生思达，1924年生思礼，1926年生思同（因肺炎早夭），共五男；1914年生思懿，1916年生思宁，共两女。

王桂荃对梁家贡献极大。她聪明过人，到日本不久就学会了日语，柴米油盐的采购都离不开她。梁启超出行，常带她照顾饮食起居。到了晚年，梁启超身体状况不佳，更要靠她悉心照料。可惜王到晚年命运多舛，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1968年死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

梁启超儿女众多，除幼亡者外，共有五男四女。支持这样

一个大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不行的。1898年梁启超逃亡日本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生活是能应付得过去的，因有日本政府的资助，他所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的销路不错，海外华侨也慷慨解囊。但后来保皇会的投资失败，《新民丛报》也于1907年停刊，梁启超的生活陷入困境，偶尔“吃米饭就咸萝卜，或清水煮白菜蘸酱油”。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仰仗康有为每月给的300元过活。但不久康的财力也告急，梁只好借贷度日。1912年回国后，生活逐渐走出低谷。他屡屡出任政府高官（1913年任司法总长，1914年任币制局总裁，1915年考察沿江司法教育、任参政院宪法起草员，1917年任财政总长），袁世凯每月还给他3000元的津贴，收入自然大为改观。1918年后虽已不再奔走仕途，但他思如泉涌，笔耕不辍，拿的是千字四元的高稿酬。1920年起任教南开大学，1923年任教清华学校，1925年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任司法储才馆馆长，1927年主持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辑，都有固定的丰厚薪水。各种演讲也有丰厚进账，1922年一年即在南方演讲五十余场。此外，他还买股票和投资，收入都不菲。

1925年，梁启超算了一笔账。当年他有三大收入：一是卖书的红利，商务印书馆两节（春节和端午）合计5000元；二是清华大学月薪400元，一年近5000元；三是段祺瑞政府每月赠送“夫马费”800元，一年近万元，合计全年大项收入近两万元。当时一个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不过五六十元，下层劳动者每月收入不过十元八元，与梁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梁启超感情丰富，对儿女们爱怜有加。他对大女儿思顺最为疼爱，从1911年开始，经常给她写信，前后写了近二百封之多。在信中梁对女儿几乎无话不谈。

梁启超的多个儿女后来成为杰出的人才。思成，著名建筑

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妻林徽因。思永，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与梁对孩子们学习的关心是分不开的。思成、思永学古建筑和考古，分明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对思忠学军事，梁则是不喜欢，但最后他还是依了儿子。思庄未决定专业之前，梁建议她读生物学，说可以做他的帮手。思庄也想帮父亲，选择了图书馆学。不幸在她学成归国时，父亲已撒手人寰。

梁启超很关心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但因寿命的关系，他只长为女和长子选定了婚姻。他为思顺选择了新加坡华侨周国贤为婿。周曾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律博士。思成与林徽因联姻，也是梁的意思。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民国时期同为进步党的首领，结成儿女亲家是顺理成章的事。

像中国大多数父亲一样，梁启超对孩子们的谋职也极为关心，积极安排。思成做东北大学教授就是父亲的决定。当时清华及东北大学都请思成去任教职，父亲经过权衡，替他做主辞了清华，就东北聘约。思永以后入中央研究院，参加安阳考古发掘，是在父亲去世前主持人李济就已应允的。梁启超虽不愿意让思忠学军事，但他还是通过关系，安排思忠入广西或广东的部队。思忠最后选择了蔡廷锴的十九路军，但不幸于1932年病逝。

可以想见，梁启超如果能长寿，对孩子们的择业、就职、婚姻会照顾得更好。可惜天不假寿，梁启超只活到56岁便故去了。

第 2 章

维新变法的主倡者

初入康门

梁启超在科举的道路上纵情驰骋，如果不是遇上一个人，他走的路途也会像其他士子一样：学而优则仕。如果是这样，恐怕近代中国就会失去一位大思想家。梁启超遇到的这个人即是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22岁以前，康有为阅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典籍，也想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康有为参加乡试没有考取，但北京、上海之行，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下决心抛弃从前所学习的乾嘉之学，改研今文经学，以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1884年开始，康有为撰述《人类公理》（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大同书》），1891年撰写《新学伪经考》，1892年撰写《孔子改制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康有为还想使他的思想为皇帝所采纳：1888年12月，他又去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便在京拟就《上清帝第一书》，明确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但这封上书未能递到光绪帝的手中。从1881年开始，康有为还在家乡开馆授徒；第

二次乡试未中后，更扩大讲学规模，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培养、网罗人才。梁启超恰在此时到了康有为的门下。

1890年8月，梁启超在广州学海堂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初次拜会康有为。梁启超当时年仅17岁，已具有举人身份；康有为已33岁，但还没有考中举人。梁启超正值春风得意之时，又已抛弃帖括学（应付科举考试的一门学问），从事当时人们所推重的训诂词章学，很有心得，颇有沾沾自喜之意。不料这种自信在见到康有为后立刻被打碎了。梁启超后来生动地记录了这次会面，说康“先生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将几百年来无用的旧学尽情驳斥。两人作了一番长谈，“自辰入见，及戌始退”。这次长谈给梁启超造成的震动是极为巨大的：“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归后当夜辗转反侧，竟不能寐。第二天向康有为请教治学的方针，康叫他学习陆王心学，并及史学西学的梗概。从此以后梁启超下决心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投奔到康有为的门下。

1890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引亲朋好友二十余人到康有为处学习。后康有为声名日隆，投到他门下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原来授课的地方已不敷使用，于是康有为在广州修建了万木草堂。这里环境幽雅，树木茂盛，是学习的好场所。康有为的教学也令人耳目一新，他不教授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之类的东西，而是教授孔学、佛学和陆王心学，首先让学生研读《公羊传》、《春秋繁露》，授课重心在于今文经学。授课时旁征博引，纵论中外古今，将历代学术渊源讲述得井井有条。除了授课，康有为还要求学生勤记笔记。对此，梁启超曾颇有心得地说：“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当如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此外，书堂里还有一本《蓄德录》，按房间次第循环传递，每人每天都要

在本子上写上几句名言警句，借此陶冶情操；康有为也可以从中窥见学生的思想动态，改进教学方法。康有为还让学生在实际的撰述中锻炼学识。《新学伪经考》著成，康让学生们分任校雠。到撰写《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则由康有为发凡举例，让学生们分头撰写。于是学生们受到启发和激励，有了自己也要从事著述的志向。

1890年至1894年，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悉心教导下勤奋地学习着，迎接他的将是时代的搏击！

参与维新宣传

1894年6月，梁启超来到北京，入住广东会馆，与麦孟华、夏曾佑等好友一起学习，砥砺学问。读书的生活很快被飞来的事端打扰了。康有为的著述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守旧派的嫉视。8月，余晋珊上书弹劾康有为，指责他“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要求焚毁《新学伪经考》。清廷准许了余的上奏，诏令两广总督李瀚章予以办理。梁启超闻讯大惊，四处奔走，设法挽回。他找到了同情维新的官员沈曾植等，请他们与广东提学使徐琪联络，让徐到李瀚章处疏通。又找到张謇，请他向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求情。梁启超的运动收到了成效，但为了安抚余晋珊，李瀚章要康有为自行焚毁著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却忙于给慈禧太后做六十大寿，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消极避战的措施。人微言轻，无可奈何，梁启超于10月离京回乡，在家乡度过了一个沉闷的冬天。

1895年3月，梁启超与康有为进京参加会试。此时正值清军在海陆战场上的一败涂地。4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

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再也坐不住了，康有为让梁启超鼓动各省举人上书言事。他们先联络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5月1日，更邀集18省举人共一千三百余人集会，会上众人慷慨激昂，痛心疾首，推举康有为起草给清廷的上书。康有为不负众望，写出了洋洋万言的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2日，上书送抵清廷。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梁启超奔走呼号，联络众人，显示出杰出的组织才能，成为康有为最坚定的追随者和最得力的助手，康梁渐趋齐名之势。

会试的结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梁启超却榜上无名。出现这样的结果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必然的是，主持会试的总裁是徐桐，副总裁是启秀、李文田和唐景崇，都对变法维新恨之入骨。他们约定，凡是在文章中有离经叛道倾向的，都摒弃不录。梁启超文采飞扬的文字自然是在劫难逃了。偶然的是，主考官看走了眼，他们发现梁启超的卷子恣意发挥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认定是康有为的试卷，于是给刷了下来，而康有为的卷子则顺利过关。但李文田还是颇为欣赏这张试卷的文采，在文末批上了“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其实梁启超已不在乎能不能博得功名，他已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变法维新的运动中了。

公车上书未能奏效，康有为决定另辟蹊径宣传变法维新。1895年8月，创办《万国公报》，随《京报》发行，免费赠送在京的王公大臣阅读。梁启超、麦孟华作为主要的撰稿人，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国家情况、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章，希望从上层入手，使他们理解、支持变法维新事业。又发起“强学会”，陈帜任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曾出资赞助。

康梁的活动为守旧派所不满，为避风声，康有为于10月离

京赴沪。果然，清廷于12月勒令强学会机关报《中外纪闻》停刊；次年1月，又强行解散了强学会。京城已不可为，1896年3月，梁启超应康有为之邀，到上海筹办报纸。8月，《时务报》创刊，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撰述。梁启超声名鹊起即由办此报始。《时务报》共出刊69期，梁启超发表文章60篇，真正成为《时务报》的主笔和灵魂，梁启超和《时务报》已融合为一体了。

在梁启超等人的鼓动下，各地变法维新的声势日盛，其中湖南最有声色。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前后两任督学江标、徐仁铸都支持变法维新。1897年10月，梁启超应陈宝箴之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24岁的梁启超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教学，培育出一批杰出人才，如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参与发起护国之役的蔡锷等。梁启超的活动激起守旧派的反对，于是他于1898年初离开长沙。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与汪康年、麦孟华等人创立不缠足会，提倡妇女解放。

梁启超还特意结交权贵，为变法维新援引势力。1897年初，梁启超去拜会张之洞。当天正值张的侄儿娶妇，宾客盈门。张听说梁启超前来，竟撇下满门宾客，与他交谈至深夜。

昙花一现的维新变法

1897年11月，德国以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为借口，派兵强占了胶州湾。以此为开端，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认为他挽救国家、大展抱负的时机已来临，赶紧从上海赶往北京。12月及次年1至2月间，接连三次向光绪帝上书。在上书中他分析了中

国所面临的严重局面，“瓜分豆剖，渐露机牙”，已危险万分。如果不发愤维新，苟且旦夕，清王朝将有覆亡的危险，到时候光绪帝想做个平常老百姓也不可得了。康有为的上书虽受到阻挠，但因言词恳切，切中时弊，已在私下传抄流传。给事中高燮上奏推荐康有为，并请求光绪帝召见，委以重任。但守旧大臣以非四品以上官员皇帝不得召见为由加以阻拦。不得已，光绪帝命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在总理衙门向康有为问话。康有为情真意切的变法主张、不卑不亢的反诘答复使翁同龢非常赞赏。在翁的荐举之下，光绪帝谕令，康有为的条陈随到随送，不得阻拦扣押。

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康有为感激涕零。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请求光绪帝当机立断，赶紧变法。他提出：“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制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之人上书。”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见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大为兴奋，决定大展身手，有所作为。4月，发起组织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这种努力，又受到守旧派的恶毒攻击，光绪帝则予以支持，他说：“会为保国，岂有不善？”但在守旧派的攻击之下，保国会日益涣散，仅开了三次会就夭折了。

尽管保国会的活动没有坚持下来，但变法维新已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不甘心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于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维新共坚持了103天，因此被称为“百日维新”。在这一百余天中，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6月16日，光绪帝第一次召见康有为，特许他专折奏